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朝没有沈万三》

13位ISBN编号：9787511231475

10位ISBN编号：7511231470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顾诚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前言

这本以《明朝没有沈万三》命名的文史札记集，大抵体现了先师治学的两大特点：一是实事求是，通过考证之法，求得史事真相；二是文、史相合，疑问萌生于文学作品，却以平直的史学考订结束，即使是史学考订之作，亦是文采斐然。&hellip;&hellip;先师曾经明明白白地说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惟有读懂了这段话，才能真正看出底蕴。这就牵涉到文史关系。古人早已经说过，文史不分家。这样的说法，或许只有对那些文史大家才适用。他们无论治文学，还是治史学，到了极致，自然就会融会贯通。&mdash;&mdash;陈宝良：《明朝没有沈万三》跋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内容概要

顾诚先生治学谨严，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一些短小有趣的历史札记，如《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谈清官》《谈万寿无疆》《从李自成的诗谈起》《明代的宗室》等，既史料充分又颇有趣味。本书收入顾诚撰写的历史札记、随笔等共计39篇，大多篇幅短小、内容有趣、见解深刻。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作者简介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下笔慎重，“文章不写一句空”。代表作有《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者曾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者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均为明清史研究的典范佳作。生平除两部专著之外，还有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发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书籍目录

### 文史札记

- 《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
- 《至正直记》的作者为孔克齐
- 《朱文正事迹勾稽》
- 《明初的两道谕旨》
- 《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
- 《明代的宗室》
- 《我对于谦的浅见》
- 《王世贞的史学》
- 《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
- 《古元真龙皇帝试释》
- 《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
- 《张献忠与知识分子》
- 《不应当肯定陈永福》
- 《明末史事杂识》

### 清代人物传略

- 《张怡》《白文选》《刘文秀》《高氏》《高一功》《李过》、《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朱常淞》；《王兴》

### 随笔与序文

- 谈文天祥和留梦炎
- 谈文字狱
- 从李自成的诗谈起
- 谈“清官”
- 谈“万寿无疆”
- 《朱元璋外传》序
- 《中国的社与会》序
- 《李自成演义》序
- 《在湖北省李自成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 《白门柳——一门贴近历史的佳作》
- 谈郑成功的抗清斗争和复台
- 在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编辑推荐

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1999）张岱的分析虽然不尽正确，多少说明了明朝的宗室制度对皇族子孙在生活上包得太多，在政治上又限制得过死。这种制度下产生出来的只能是一大批庸碌之辈。——《明代的宗室》（1982）在封建史家的笔下，张献忠大概是被歪曲得最厉害的一位历史人物。——《张献忠与知识分子》（1981）所谓“荜阳大会”上决定“分兵定向”不过是好事文人的纸上谈兵。……历史上确实不存在这次大会。——《明末史事杂考》（1982）在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分野，有不畏艰难向上攀登的执著追求者，也有靠几声空喊、些须引进而跻身于史学家之列者。——《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序（1996）我是一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顾诚

# 《明朝没有沈万三》

精彩短评

1、《明朝没有沈万三——顾诚文史札记》到手三个星期了，仍然没有读完。我觉得自己是个囫圇的读者，一两个小时便读罢一本书是常有的事；这次的速度出奇地慢，正是因为顾诚先生的书不但精彩，而且内容格外丰富，为了顺利消化，只有慢慢读才不致噁到。说说这本书吧。《明朝没有沈万三》是一本集子，收入顾先生撰写的39篇文章，包括文史札记、随笔和人物评传等。文史札记中，既有考证名人的《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也有颇具趣味的《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人物传记的主角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几位主要成员，如白文选、高一功、李来亨等；随笔部分中除随笔外，还包括一些序文和演讲稿。平心而论，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用来打发时间的书；它是一本学术小品，里面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大量严格的学术考据后写成。虽然如此，这本书并非只有历史研究者才可读之，所有对历史特别是明朝历史有一点兴趣的人都可以读得进去，就算是像我这样对历史并没有太大兴趣的人，也能读得兴味盎然。读后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处：对史料的大量引用；对史料进行有选择的使用；行文流畅，富有文采。首先，顾诚先生在文章论述过程中，不断旁征博引，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对大量史料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例如《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仅直接引用的脚注就有63处，更不论文中还有大量的间接引用，和对有关其他史料的多次提及。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如此，可见先生阅读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尝闻先生生前曾多年每天在图书馆从开馆一直坐到闭馆，持续阅读，中午仅用自带的冷馒头充饥；以这样的刻苦才能够获得一些超越流行观点的新见解。同时，顾诚先生对于所获史料并非直接套用，而是先对其真实性与准确性加以判断后才予使用。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中，顾诚先生转录了由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撰写的沈万三侄儿沈汉杰的墓志铭。这份材料可说是非常贴近沈万三本人的，然而即使是对这样的材料，先生仍然提出了一些疑点：“刘三吾这篇墓志铭明言沈汉杰死于洪武四年（1371年），过了20年之后应沈玠之请而做，撰写时间当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又得自沈玠提供的行状，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然而，在反复阅读这篇湖广茶陵人的大手笔之后，总觉得有些不足，且不说限于墓主是沈贵（万四）的后裔，对沈富（万三）只能一带而过，问题是作者前面写沈玠是沈万四的曾孙，后面依据行状沈玠显然是沈万四的孙子。又如他说沈家向朱元璋献上1500两银子，用来建造廊房650楹，给1000名军士提供甲马，银子数额过小办不了这么多事。《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银二千锭、黄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据廖道南作《刘三吾传》，刘三吾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由茹瑺推荐入朝任左春坊左赞善，不久升学士。由于入朝较晚，他在侍从时固然可以听到朱元璋夸奖‘吴中沈氏’，但对‘国初’（即洪武初年）的事情就未免隔膜，把沈万三的两个儿子向朱元璋献上大批金银误认作沈万三兄弟并不奇怪。沈玠送了润笔请这位‘翰林之大老’为其父撰写的墓志铭大概只有稍加改动才能付之镌刻立石。自然，刘三吾答应为沈汉杰写墓志铭，沈玠提供的行状才能保存下来，刘三吾听说的一些沈家情况尽管不大准确，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请原谅我将这一段内容原封不动从书上照抄来，因为其中每一处的考证，都是基于细节的，并与同时期的其他史实加以比较，可谓将考据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此外，由于阅读量极大，顾诚先生对于什么样的史料值得相信、什么样的史料特别需要怀疑，也有自己的心得。例如他提到，“《明史》的纂修者往往并未加以核实，仅依据某种记载敷衍成文，一经皇帝‘钦定’便成了‘权威性’的正史，影响非常恶劣。”因此在对《明史》中的记载进行引用时也就格外小心，常常要反复加以考据后再使用。更为可贵的是，顾诚先生专注于细节，却又不拘泥于细节。如在引用《王半轩传》时，先生写道：“原文注明作于正统己卯秋八月，正统无己卯年，但文后有景泰改元夏五望日同郡人监察御史邹亮跋，可知确为正统年间所作。”可见先生在史料选择上既不盲目照搬，也不盲目弃用，这种选择的得心应手足见大家风范。顾诚先生曾说：“我是个对文学颇有爱好的人，同时又有点考据癖，遇事喜欢盘根究底。”这本集子充分展现了先生“文笔好”这一特点。整体上，行文生动有趣，虽然引用资料多为古文，但先生穿针引线的功力甚为深厚，全文读来并不觉得累。也有一些细致入微的描写有很强的画面感。如《朱文正事迹勾稽》一文中的这段描写：“‘洪都被围既久，内外阻绝，音问不通。’朱文正手下的战将和士卒伤亡惨重，他知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决定派千户张子明用东湖（东湖在南昌城内）里的小渔船趁夜间陈军不备之时从水关潜出，‘越石头口，夜行昼止’，六月二十五日历时半月才到达朱元璋驻处，报告了南昌危急的情况。朱元璋问他陈友谅兵势如何？张子明



## 《明朝没有沈万三》

回答道：‘友谅兵虽盛，而战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贼之巨舰将不利用，又师久粮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当即指示：‘汝归语文正，但坚守一月，吾自当取之，不足虑也。’张子明返回途中在鄱阳湖口被陈军捉获。陈友谅对他说：‘若能诱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贵。’张子明假意答应，在陈军押送下来到南昌城下，大声呼喊：‘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友谅大怒，下令将其杀害。”这一段不仅完全写出了张子明的气节，也令人有如身临其境一般，读之凄然。总之，对于顾诚先生这样一位学问深厚但寡有著作（1978年后顾诚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总计也不过50万字）的学者来说，这本书中的内容可说是经过了多次精雕细琢，不仅能够从中读到许多关于明朝历史的新见解，更能窥得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最后，既然这本书叫做《明朝没有沈万三》，那么这本书关于沈万三究竟写了些什么？答案是，沈万三并非像广为流传的那样是明朝人，他生于元朝、卒于元朝，并未见到明朝开国的曙光。

2、我不是研究历史的，甚至都不是文科生，但是对顾诚先生还是有耳闻的。说实在的本书的前部分简述的事件我大多不知道，读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所以就选着一些感兴趣的读了。非常佩服顾先生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史的研究就是该一丝不苟，严格细密，这样才能还原真实的过去，给后人留下可靠的史料，这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顾先生03年仙去，本书由其弟子编撰，在后记“跋”中有详细阐明。书中内容很多，我想挑两点来说。第一，在杂文与序文部分收录了顾先生为《朱元璋外传》做的序，先生非常赞同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增强其可读性。如果单纯正史的话，相信很少人愿意去读，但是将历史与文学的结合，是普及历史的最佳选择。如果顾先生能够再多活几年的话，他老人家看到《明朝那些事儿》火遍大江南北，将是一种什么心情。相信这对穷尽毕生精力研究明清史的他来是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另外一点就是李自成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关于这一点我存在些许疑问，真的有必要倾尽一个研究所之力去研究李自成这个历史角色吗？研究历史是必要的，但是无微不至的研究或许有点浪费财力物力了吧，如果每个历史人物都有个研究所去研究，国家社会将会产生多大的负担？各位读者你说呢？

3、文/严杰夫明史向来是国史研究领域的“显学”，不仅是因为这是五千年中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也是因为朱氏王朝276年的国祚，遗留下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后人想象或演义。君不见，那套《明朝那些事儿》常年高居历史类图书榜单之首，就连方舟子这样的网络红人都要“戏说”一把明史，以显示一下自身的学识。然而，殊不知浩如烟海的明史资料，或由于作者立场各异，或由于为社会现实考量，各种史料文献的记载间有太多的抵牾，让人很难分辨其中真假。即使如那个年代的学人著作，诸如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张岱的《石匱书》，都难免有阙误之处，更不用提如今这些四处流传的野史了。当代著名明史学家陈宝良言“明季野史，多达千家。记载歧出，桀讹甚多。”对如此多的史料“去伪存真”，不得不用考证、训诂这些传统的治史方法，这就要求治学者有庞大的阅读量。著名明清史家孟森曾对史料根据可靠性分作若干等级，“其最初未经文人之笔点窜者，有如塘报，有如档子，有如录供，此可谓初级史料。至于入之章奏，腾之稟揭，则有红笔揭帖，汗牛充栋，已为进一步史料。至科臣所抄，一方下部议行，一方已录送史馆，其中已微用文史句例点改，此则与史料发生关系，又为进一步之史料。馆臣据此按日排纂，谓之目录，与记录王言之起居注，皆以日记，居然史之一体矣。而其距勒为正史，则等级尚远”。如此多类目的史料，只有那些真正去一层层爬梳的人，才有资格担当起“秉笔直书”的史官重任。因此，近代以降，治明史者固多，然而能治出让人信服的“信史”者，惟数人而已。在解放后更加屈指可数的名家中，除去如雷贯耳的吴晗外，恐怕就要属写出煌煌《南明史》的顾诚老师了。不过，《南明史》固然是集顾师的学术成就于大成者，然而要细品他那精于考据的治史方法，恐怕还是应当读一读他的文史札记。谈到顾师的札记，最令人瞩目的恐怕就是那篇《明朝没有沈万三》。作为一个民间传奇人物，沈万三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特别是万三向朱元璋献金筑城的传说，更是早已深入人心。于是沈万三生活于明初的史实似乎无人怀疑。然而，顾师却通过考证断言，沈万三早在朱元璋“成事”之前卒亡，后人不过是将沈家后代的事迹错安于沈万三身上了。作为一篇典型的札记，《明朝没有沈万三》一文并没有学术论文那般严肃的学理推论。顾师用了较轻松的文字，却仍是严谨的逻辑、详细的考证，为读者清楚地阐述了沈万三不是明代人这个历史事实。于是，细细读来，这篇《明朝没有沈万三》竟颇有孟心史当年作的那篇《董小宛考》的味道了。如果说，《明朝没有沈万三》还只是顾师的“游戏之作”，那么“清代人物传略”这一系列就毫无保留地展现出顾师笔下的“真章”了。顾师在这一系列中共计为10个历史人物立了小传。这些人物均为明末清季的抗清“领袖”，除去南明小朝廷的监国朱常滂外，其余9位则悉为明末农民运动的著名将领。在这10篇传略中，顾师通过考证和梳理，廓清了这几位在史籍

中“没名”却分明是明季极为重要的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在为这些人物立传的过程中，顾师不仅展现出极为严谨深邃的史学功力，而且笔端的点评也流露出爱憎分明的立场，这种立场在传书朱常澆时格外明显。在顾师的笔下，朱常澆无疑是明季统治者昏庸无能的典型代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南明小朝廷之所以无法抵挡满洲铁骑的最本质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这10篇传记，连同《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与知识分子》等诸篇札记一起，我们已经能够在其中隐约读到《南明史》只鳞片爪的影子。正是在这些札记小传的基础上，顾师又呕心沥血十多年，最终成就了《南明史》这部巨作。读顾师笔下的那些札记，自然无法获得当下畅销的“戏说”作品中的那些八卦和劲爆，但却能让真正的历史爱好者读到那种自古因袭而来的治史传统。这类传统，自史迁流至司马光，再自司马光流至王世贞、张岱，再流至孟森、顾颉刚、陈寅恪等先辈，最终流到顾师的文章中灼灼闪光。于是，在顾师笔下的“明朝那些事儿”中，我们不仅读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悲凉，更是读到了一个真正的“史官”所持的情操。

4、这是一本很不好读的书，因为都是顾诚先生写的论文，并不是给程度太差的人看的，叙述时往往提纲挈领，基础不够如我者，难免常常一头雾水。然而，这又是一本很好读的书，言简意赅，论证扎实，引用史料丰富，没有故弄玄虚之处，一本书涉及了数十种资料，都是平时不大容易看到的东西。说观点新颖，则《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发前人所未发，《朱文正事迹钩稽》把握住了人们经常忽略细节，连《谈我国史籍中有关熊猫的记载》这样的小文章，也写得异常精彩。顾诚先生写作最大的特点是扎实，字字有来历，不发空头议论，绝不借用古人之嘴，浇自家胸中块垒，体现了真史家的风范。相比之下，当今的历史写作乃至历史研究颇有一种风气，动辄将当代人的逻辑嫁接到古代去，让古代变成现代社会的简略版，于是，古人反而要为现代人想办法、求方案，只好或励志，或改革，或修道，或宫斗，唱来唱去，依然是“古为今用”的那套旧把戏。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不论是象牙塔之内，还是坊间市肆之中，大家都在遵循这个规则，痛心疾首者、精神亢奋者、虚伪矫饰者、工于经营者，居然按一个逻辑来动作，这才令人备感无可奈何。事实是，面对历史，我们始终缺乏一种真正的敬畏，当打量先人的眼光，变得如《狂人日记》中揣摩肥瘦的邻里们的眼光时，历史其实已经死了，它再也无法启迪我们的智慧。用当代逻辑贯穿古代，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自返，我们往往会被它的解释力所迷惑，觉得“从来如此”、“古有明鉴”，我们很难再去具体分析，同样的话、同样的行为，古人其实有不同的意味，它可能根本无法与当下的情况相互比对、相互印证。遗憾的是，在我们的脑海中，已经有太多类似的荒唐，诸如“中国2000年的封建史”、“皇权不下县”、“专制主义传统”、“儒家为统治者所利用”之类，都是在证据未周延的前提下，只在逻辑上演绎一番，就升格成了真理。而这样“必然的历史”，只能笑话连连。就像培根曾信誓旦旦地认为，印刷术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那样，确实，古希腊科技那么发达，私家著述那么多，又有莎草纸和油墨，还懂几何，怎么可能发明不出印刷术呢？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不合理地延宕了上千年。历史不是数学，没有细节的真实，就没有一切。我们可以为历史想象出一套整体而严密的逻辑解释来，然而，历史上哪一次类似的尝试，不以失败而告终？顾诚先生辞世已近10年了，先生留下的严谨治学、追求真相的风范，令后辈高山仰止。这本书很薄，从中却能读出一位大师的操守、坚持与学养，这，胜过了万语千言。

5、朱元璋没杀沈万三——读《明朝没有沈万三》杨津涛刊于2012年11月3日《城市快报》，题为《顾诚笔下的明朝那些事儿》，有删节说起《明朝没有沈万三》这个书名，不只一次看到有网友在豆瓣上吐槽，知道顾诚先生的，都说一本学术好书让一个烂名字给毁了；不知道顾老的读者，更是直接将这本书归入庸俗畅销书的行列。其实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孙献涛就是顾先生的学生，当然希望这套“顾诚著作系列”足以传世。但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上，好书未必能让读者注意，反而各种攒出的烂书，因为通俗易懂、话题劲爆，常常成为读者的宠儿。《明朝没有沈万三》这个书名当然也未见得好，但一来如顾门弟子陈宝良所言，深得顾先生“治史三味”，二来也确实抓人眼球。本书是顾诚在《南明史》和《明末农民战争史》两部专著之外一些零散文字的结集，第一部分是包括《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在内的十几篇论文，涉及学界的一些疑难问题，比如朱元璋对自己身后的布局，李自成称帝时间等。沈万三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富豪之一，他的故事广为流传，如朱元璋定都南京，让沈万三捐资筑城，结果有了聚宝门。顾诚核对各种原始资料，对沈万三其人做了详尽考证，发现他其实生活在元朝。沈氏家族几个人的墓志铭显示，洪武元年（1368年），沈万三的儿子已经62岁，沈万三如果还在世的话，就要80岁了。按通常说法，朱元璋在平定云南后（1382年）将沈万三发配到了那里，而那时沈万三已是百岁之人。陈说不攻自破。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的屠蜀暴行尽人皆知，对知识分子尤其



愤恨，顾诚尝试为其“洗白”。确有史料显示，张献忠对知识分子一度相当宽容，他率部攻占河南宝丰县后，曾召集县里的生员，对他们说：“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张献忠政权的创建。因为时代的原因，顾诚在几部著作中，对农民军的赞颂都不加掩饰，但他也承认张献忠在四川“后期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终未因对农民起义的同情而回避事实。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作者为《清代人物传稿》所写的十篇小传，主要是高一功、李过、潞王等明末风云人物，他们在正史中大都无传，生平事迹散见于各种史料。顾诚通过钩沉各家野史，澄清了这些人的生平。最后是一组以“张楠”为笔名，发表在《蒲公英》杂志的一组文史随笔，谈的都是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关羽是怎样捧起来的？”此外，还有少量给其他学者写的序文。在《蒲公英》上的那组文章，写于改革开放之初，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观感。《谈“万寿无疆”》一文明言，从中国古代到“文革”时“万寿无疆”的口号，都不是真的希望君主或领袖能活上一万岁，而是作为等级观念的一种存在。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常的情况是“各种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人民的公仆，职务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此后讨论关羽由一名普通将领，被封王、封帝，乃至成圣，为的就是揭示个人崇拜的成因。又如《论文字狱》一篇，指出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自秦始皇焚书坑儒，至清朝动辄以一言一句，给文人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株连全族，都曾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勇敢之士，他们“在大雾弥天的文字狱魔影下仍然不顾朝廷的禁令森严，冒着生命危险把许多禁书深藏秘抄，才使相当一批珍贵文籍得以逃脱厄运，一直流传到今天。”用今天的流行话语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对良心与责任的坚守。顾先生也是如此，他在“文革”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潜心收集史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成果。傅斯年先生说，治史的精要在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另一位史学家陈垣先生则说，历史研究就是要对史料“竭泽而渔”，意即是把能找到的史料都找到。顾诚就是如此，一篇几千字的论文，前后引证的史书、笔记、县志也往往有数十种。在陈列了如此多的证据后，得出的结果，也自然让读者信服。兼之顾诚在学者中向以文笔好知名，所以纵是纯学术性的文章，也都能领略阅读的畅快。 [http://epaper.tianjinwe.com/cskb/cskb/2012-11/03/content\\_6779465.htm](http://epaper.tianjinwe.com/cskb/cskb/2012-11/03/content_6779465.htm)

6、顾诚先生断言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没有说服力的。早已大红大紫的古镇周庄，游客都耳熟能详，对“沈厅”和沈万三，恐怕也不陌生。“沈厅”是沈氏后人在乾隆年间建造的，大厅里有沈万三事迹简介。这个江南巨富，在明朝初年出资修建南京城墙，以及许多公共建筑物，甚至还想出资犒劳军队，引来朱元璋暴怒，差点掉了脑袋，幸亏马皇后说情，才改为流放。富可敌国者的政治风险，大概是游客都会有的感想，也让周庄镇多了一点历史话题。有考据癖的历史学家往往要煞风景。已故明史专家顾诚，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论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所得到的结论，与先前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按照顾先生的说法，既然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已经死去，那么洪武年间与朱元璋的纠葛，统统属于子虚乌有，“沈厅”关于他的事迹简介，似乎要重写了。

事情真的如此吗？顾先生的结论并非毫无根据，却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必须逾越《明史》的两道关口。其一是《明史·后妃传》中的一段话：“吴兴富民沈秀（引者按：即“沈万三秀”的略称）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之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倘若沈万三在洪武元年以前已经死去，修建南京城墙及犒军之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难道是《明史》胡编乱造？其实《明史》所说是依据的。晚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写道：“南都沈万三秀者甚富，今会同馆（按：礼部设在南京接待朝贡使节的宾馆）是其故宅，后湖（按：玄武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乃其所筑。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对曰：‘每一军犒金一两。’上不许，由此遂欲杀之。太后苦谏，得流云南。”明末遗民张岱的《石匮书》也有类似记载：“吴兴民沈万三，家甚富，有盆曰聚宝，能益财，为帝造都城三之一，又为帝犒军。帝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曰：‘妾闻法也者，所以诛不法也，非所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未有不以犯吏辟，陛下何烦！’上释万三，流之滇南，瘞其盆城下，名门曰聚宝。”看来《明史·后妃传》直接援引《石匮书·皇后本纪》的这段话，而删去与“聚宝盆”相关的文字。不过南京的城门之中确实有一个叫做聚宝门，但未必因为掩埋沈万三“聚宝盆”而得名。其二是《明史·佞幸传》中的一段话：“吴中故大豪沈万三，洪武时籍没，所漏资尚富，其子文度匍伏见（纪）纲，进黄金及龙角、龙文被、奇宝异锦，愿得为门下，岁时供奉。”倘若沈万三死于元末，为什么洪武年间会有抄家（即

籍没)之祸呢?这也是需要解释的。《明史》的这条资料其实也有依据。王世贞《国朝丛记》的“纪纲罪状”条写道:“吴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漏资尚富,而文度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纪)纲舍人,匍伏见白,金黄金百两,白金千两,龙文被一床,龙角一株,奇宝十具异缯绮四十匹,愿的从贽御,列为外府外廐……”清初史家万斯同私人编撰的《明史》(也称《明史稿》),在“佞幸传”中,也引用了王世贞的文字,写道:“吴中故大豪沈万三富敌国,洪武时已论死籍没,所漏资尚富……”看来王世贞、万斯同都相信,朱元璋籍没沈万三家产是确有其事的。顾先生认定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已去世”,主要的证据是,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中的一段话:“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所谓“张士诚据吴时”,是指元末群雄蜂起,张士诚割据苏州一带的时候,据此断定,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已去世。但是,沈万三是一个传奇人物,有关他的传闻,大多互相矛盾,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只是众多传闻中的一个说法。即使乾隆《吴江县志》卷五十六“旧事”一节,也有不同说法。就在“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这条史料后面,该书的编者引用了另外两条史料,一条是《明史·后妃传》所说:“洪武时,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云云(见上文)。另一条是引用明人王世贞《国朝丛记》中的一段话:“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朱元璋)籍没其家,所漏资尚富”云云(见上文)。王世贞是晚明文坛大家,他的《弇州史料》是研究明史的资料宝库,《国朝丛记》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不仅《明史·佞幸传》引用这一段话,乾隆《吴江县志》也引用了,可见该书编者并不轻信沈万三死于元末的说法。《吴江县志》编者在引用此条史料之后,特别加了一个按语,表明对此事的看法——“按:此条乃当时奏纪纲罪状,语最确实,《明史·佞幸传》亦采之。夫万三既籍没,而文度所进纪纲尚如此,则其富真不资矣。但莫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其事互异,未知孰是?”在记录沈万三的几条“旧事”时,表示对互相抵牾的说法存疑——“未知孰是”?但从语气上揣摩,似乎更倾向于相信“大豪沈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而不相信“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有鉴于此,顾先生引用上述证据,证明沈万三死于张士诚据吴时,便有点飘忽了。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弟沈贵,字仲华,因为兄长叫做万三,人们称他为万四。兄弟二人随父亲沈祐,从湖州南浔镇迁来苏州周庄镇。要了解沈万三的事迹,周庄当地人的记载,更有说服力。乾隆十八年编纂、嘉庆十四年增补的《贞丰拟乘》,实际上是一部周庄镇志,其中不少资料,证实沈万三并未死于元末。该书的“杂录”写道:“洪武中,万三上疏,愿助筑都城,又请犒军。帝怒,欲诛之,马皇后谏曰:‘彼虽富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疑而杀之?’遂得免。(帝)诏万三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不但提及修建南京城与犒军等事,还说到朱元璋命他建造多处公共建筑,言之凿凿。接下来,还提到他宴请礼部侍郎莫礼的情节:“洪武二十三年,权幸莫礼过访。万三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缂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桌,每桌置羊脂玉二枚,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筋行酒。用白玛瑙盘,盘有斑纹,乃紫葡萄一本,五猿采之,名五猿争果盏……”描摹他巴结权臣,活灵活现,如同亲眼目睹一般。在这一段文字之后,有这样的编者按:“万三富至此,不自韬晦,上交天子,下结权臣,宜其取祸也。”倘若沈万三死于元末,何来这样的感叹!该书的“人物”,写到周庄人徐民望与沈万三的关系:“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庄。明洪武初,沈万三因事被逮,多所株连,人情汹惧,谓欲尽诛贞丰(按:周庄别名贞丰里)居者。南溪奋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铁钺,叩阍哀请。太祖嘉其志,温旨慰劳,赐玺书五字云:‘尔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为粮长。”这条信息,引自《徐氏家乘》,并非道听途说之词,它所说的“明洪武初,沈万三因事被逮”,应该是可信的。洪武年间的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反映了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而朱元璋与沈万三的纠葛,则反映了皇权与富可敌国者的矛盾。弘治《吴江志》卷七“居第”写道:“万三,长洲人,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跨于各邑,故吴江有是宅也。洪武末年,坐蓝党(引者按:蓝党指蓝玉党案),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今六世孙洪,字雄仲,仍居旧址,工书法,士林重之。”沈家卷入蓝玉党案,是不争的事实。事情是由沈万三的赘婿顾学文引起的。吴江县同里镇陈某在朝廷为官,其子呆憨,娶妻梁氏国色天香,且知书善吟。家住周庄镇的顾学文仰慕梁氏,经常利用粮长押送税粮之机,乘船来往同里,停泊在陈家河下,或者挟声妓豪饮,或者乘凉放歌,勾引梁氏。后来通过“卖婆”牵线,送珍贵首饰,互相诗歌酬答。陈某发觉后,意欲告官,又恐辱及门户,且不足以致其死,等待时机报复。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案发,陈某诬告顾学文为“蓝党”,形成大狱,株连顾、沈两家,以及当地大族。弘治《吴江志》写道:“洪武二十六年



春，适凉国公蓝（玉）坐事在拿，序班（陈某）从旁面奏：‘臣本县二十九都正粮长顾学文，出备钱粮，通蓝（玉）谋逆。昨听宣谕，不出城，见在勾栏某娼家宿歇。诏捕之，果于娼家获焉。连及其父常，弟学礼、学敬。妻族沈旺（沈文度）、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戴、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顾（学文）又指其仇殷子玉等七十二家。其七十二家之中，又各自互相扳指莫阿定、莫寔、张寿、侍郎莫礼、员外郎张瑾、主事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由此党祸大起，蔓延天下，俱受极刑，至（洪武）三十一年方息。梁（氏）亦被父逼令缢死。’顾学文之狱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是有案可查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解决相权与皇权的矛盾，洪武十三年处死左丞相胡惟庸，怀疑“满朝都是胡党”，蔓延株连，十年之中处死三万多人，并且用《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众。此后为了解决将权与皇权的矛盾，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唆使锦衣卫头目控告大将军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蓝玉后，罗织了一个庞大的“蓝党”，受诬陷至死的有一万五千人，他还特地颁布了《逆臣录》，以正视听。《逆臣录》第五卷收录了顾学文的“供状”，这份“供状”半文半白，似通非通，读起来很吃力，意思还是很明白的——顾学文参与了蓝玉的“谋反”阴谋：“因见凉国公总兵多有权势，不合要得投托门下。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内，央本官门馆先生王行引领，前到凉国公宅内，拜见蓝大帅之后，时常馈送礼物记异样犀带，前去往来本府交结，多得意爱。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有凉国公征进回还，是学文前去探望。本官正同王先生在耳房内说话，言问：‘这个是谁？’有先生禀说：‘是小人乡人沈万三女婿。’本官见喜，赐与酒饭吃饮，吩咐常来这里说话。本月失记的日，行前到凉国公宅内，有本官对说：‘顾粮长，我如今有件大勾当对你商量。’是学文言问：‘大人有甚吩咐？小人不肯不从。’本官又说：‘我亲家靖宁侯为胡党事发，怕他招内有我名字，累了我。如今埋伏下人马要下手，你那里有甚么人？教来我家有用。’是学文不合依听，回对一般纳粮副粮长金景并纳户朱胜安等，说知前因，俱各喜允，前到本官宅内，随从谋逆。不期败露，到官取问罪犯。”其中破绽百出，顾学文作为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赘婿，竟然如此草率地答应跟随蓝玉“谋反”，令人难以置信。后人的考证已经证明，《逆臣录》中所有罪犯的供词，都是特务机构锦衣卫编造的，虚构了蓝玉“谋反”的情节，目的是为整肃开国功臣提供借口。顾学文的供词也不例外。顾家与沈家因此遭来一场大屠杀，弘治《吴江志》所说：“由此党祸大起，蔓延天下，俱受极刑，至三十一年方息”，应是确凿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由于顾学文的风流韵事，背后的深层原因，与沈万三家族富可敌国密切相关，在皇帝心目中，富可敌国者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非加以整肃不可。以上种种史料，都从不同侧面表明，断言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考辨，虽然枯燥，却很有必要。不过，一般旅游者感兴趣的，是沈万三与周庄的关系。与沈万三有关的周庄古迹，见于《贞丰拟乘》的，就有三处：住宅、别墅园林与仓库。他的住宅并非今日所见的沈厅，而在镇郊的东垞村。该书写道：“沈万三宅，在东垞村。”沈万三的别墅园林则在银子浜：“银子浜，系万三之园，湖石尚存，为当年胜游地。浜非通渠，其尽处有水一泓，通泉，迂回曲折，旱岁不枯，筑小丘于上，名金钩钓月。”在住宅与园林之间，有一处仓库，名为东庄地：“东庄地，乃万三东仓废基，是其积粟处。东通住宅，西接银子浜，园亭仓库相为联络。”光绪《周庄镇志》卷一“胜迹”，转引此段文字，补充道：“水底有古墓，坚实完固，未知所葬何人。其以银子名浜者，殆因万三之多金欤！或云，是当年鼓铸处。”沈万三是个传奇人物，野史与地方志所记，大多出于民间传闻，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厘清真相并不容易。例如《贞丰拟乘》卷下“仙释”，有这样一段传说：“沈万三，现为地仙，尚在。向故有家，未大富耳。元末异人张三丰遇之，曰：‘欲炼金丹，必得大福人相助，遍阅天下，无如君者。但必三百金为资，三年后启炉分赠。’万三欣然与之。逾年复至，云：‘遇见难人，以此金相济矣，如欲成丹，可再付金如前数。’万三亦即解囊无吝容。此殆仙家所以试人也。丹点铁可以成金，服之可以成仙，万三之富大抵皆金丹所致耳。后明太祖籍其家，戍云南。康熙三年，三王叛，凡滇逆优伶一时星散。有贴旦扬州人，中途失侣于乱山中，见大宅一所，因款门借宿。顷之，一老人出，幅巾深衣，苍髯古貌。见而异之，引入与语，知为江南人，曰：‘吾与汝为乡亲，可知当年有沈万三乎？吾是也，以服丹故得不死。’因令老妻出见，相对欣然……”通篇荒诞不经，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若据此认定沈万三活到了康熙年，岂不令人绝倒！

7、历史学家顾诚先生治学谨严，一贯坚持“竭泽而渔”和“无信不征”的考实风格。在钩沉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之上，他撰写了一些短小有趣的文史札记

## 章节试读

### 1、《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第116页

...一个史学家要如实地写作本朝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正直的史学家要想写出一部本朝信史，不仅需要具备正视事实的勇敢精神，而且需要掌握巧妙的表现手法。王世贞就是基本符合这种条件的史学家。我看您也是呀~嘿嘿嘿

### 2、《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明代的宗室

朱元璋对他身后可能发生来自两方面危及中央朝廷的威胁都作了反复周密的权衡，杀功臣是为了维护朱家天下，这是他注意的重点；但如果以为他真认为朱允炆有叔叔们的保驾就可以稳坐江山，那就把深谋远虑的朱元璋估计得太低了，或者对洪武年间某些亲王的觊觎帝位未予重视。

宗室问题在明代历史上占着相当突出的地位。大致可以这样说，在明前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宗室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一再引起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数的迅速增加，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寄生集团，给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大大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初封建诸王最重要的特点是赋予诸王以兵权。

护卫兵是指亲王直属的军队。洪武五年正月规定：“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按照明朝军制一卫五千六百人，三卫甲士约为一万六千多人。加上亲王有权节制封国内的守镇兵，军权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洪武中期年长诸王经常奉诏统率大军出征，年纪小的也跟着学习军事，明初诸王在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里获得胜利，由宗支藩王变成天下共主。在即位的前后，为了争取诸王的拥戴，他需要打出恢复旧制的旗号，恢复了那些建文帝贬削的藩王，对诸王赏赉有加，示之以恩。甚至不惜改变祖制给予宗室以更高的品级礼遇。例如，按洪武年间的规定，郡王之子镇国将军为三品，孙辅国将军四品，曾孙奉国将军五品，玄孙镇国中尉六品，五世孙辅国中尉七品，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为八品。朱棣为了笼络人心，“遂加镇国将军从一品，辅国将从二品，奉国将军从三品，镇国中尉从四品，辅国中尉从五品，奉国中尉从六品”。另一方面，朱棣自己是通过武力夺取了帝位的，当然不能容忍其他兄弟也照样做。所以他在即位以后对于解除诸王的兵柄是抓得很紧的。永乐元年革去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官属；四年齐王朱榑也被削去官属和护卫，不久废为庶人；六年削岷王朱楙护卫，罢其官属；十年削辽王朱植护卫；十五年谷王朱穗被废为庶人；周王朱见势不妙，赶紧自动献还三护卫。终成祖之世，洪武时期掌握兵权的十三位亲王削去护卫的占了六位，即将近半数。与此同时，朱棣还大封靖难功臣，把大批具有作战经验的武臣保留下来，作为加强中央政权力量的支柱。这种同朱元璋一面大肆屠戮功臣，一面让诸王典兵完全相反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朝廷和诸藩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

朱棣实现了朱允炆想要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目的。但是，他只解决了眼前的问题，朱元璋留下的制度并没有多大改变。他自己的儿子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仍然按祖训设立了三护卫，从而埋伏下了新的危机。宣德元年（1426年）高煦的叛乱再一次证明了亲王典兵不是办法，《皇明祖训》中亲亲的说教抑制不了手握重兵的亲王们的政治野心。宣德年间，朝廷充分地利用了平定高煦叛乱的威望，不仅迫使绝大部分洪武、永乐两朝所封藩王交出护卫，而且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宗室的控制，对他们的活动严加防范。大致可确定，从宣德以后个别藩王虽然还拥有护卫，作为一种制度来说亲王典兵已不复存在了。从此，亲王在政治上仅拥虚位，既起不到朱元璋所寄予的藩屏国家的作用，也不足以构成对朝廷的威胁。

## 《明朝没有沈万三》

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规定诸王、公主的岁禄为：亲王支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外加各种杂项。公主已受封者赐田庄一所，每年收租一千五百石。郡王岁支禄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及其他杂项。郡王的嫡长子袭封为郡王者岁禄按始封郡王的一半支給。“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到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指示户部重定宗室禄给，表面上的理由是：“朕今子孙众盛，原定亲王岁用禄米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亦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制，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户部重新议定的标准为：亲王岁赐禄米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國中尉四百石，辅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这一方案经朱元璋批准后载入重定的祖训录（改名为《皇明祖训》）。由于担心诸子对减禄过多会不高兴，朱元璋特地把他们召集到京师“谕以量减禄米之故，且以《皇明祖

按洪武九年的规定，郡王诸子不过赐予免税的永业田六千亩，几代以后子孙分异所得田产无几，势必降到一般庶民的水平。对于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来讲，要让自己的龙子龙孙等同于齐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宗室禄给时干脆让政府按规定的标准把他的子孙的生活包下来，永远“不类齐民”。我们只要粗略地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郡王诸子即后来的镇国将军每位年禄一千石，大致相当于六千亩田所能收到的租税，可是郡王诸子之下还有数不清的将军、中尉、县主和仪宾之类呢！可见，这是朱元璋耍的一个以退为进的大花招。

在谈到宗室的禄给的时候，有必要补充说明两点：一是政府花在宗室们身上的钱财并不仅是禄米，举凡宗室的婚礼、丧事、造宫、营坟以至于仪仗、校尉、王府官员等等全部开支都由政府按不同规格支給。二是宗室的岁禄标准只是一个大致的规定，实际支給过程中变化是很大的。

### 明宗室人数表

洪武年间

58人

《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二

永乐年间

127人

同上

正德年间

2945人

郑晓：《今言类编》

嘉靖三十二年

19611人

《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二

嘉靖四十一年

28840人

《宗藩条例》

隆庆三年

28492人

《国榷》卷六十六

万历二十二年

62000人

《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一

万历三十二年

80000以上人数

同上



## 《明朝没有沈万三》

有明一代的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增加一倍。明初基数不大，增加一倍不致影响大局；中期以后基数甚巨，每翻一番动辄万计，朝廷自然无力供养。

关于宗室人员每人应得禄米的平均数，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按等级分类的宗室确切数字，只能从一些估算中来推测。王世贞的说法是，“酌禄之中，人各得禄五百石，益万人是益五百万石粟也”。嘉靖八年礼部尚书梁材在《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中曾以晋、周、鲁、楚四府为例，指出“山西初封晋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员，共岁支禄米八十七万二千三百六石零。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千五百石。山东初封鲁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三百六十一位、员，其岁支禄米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湖广初封楚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国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五百八十七位、员，共岁支禄米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石”。按疏中所引材料推算，晋府宗室平均每人岁禄为305石，周府479石，鲁府385石，楚府442石。梁材又说，“举此五府（疏中实际只列出四府）则天下王府可知也”。大致而言，嘉靖初国家支给每一宗室的岁禄在400石左右。又据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学士李春芳等条议中所说，“二百年来宗支繁衍，郡王二百四十余位，将军、中尉一万二千余位，郡、县主、君一万六千六百余位，岁支禄米八百六十余万石”。按照这一材料计算，嘉靖末宗室人数约为28840人，岁支禄米860余万石，平均每人每年近300石。明显地反映了政府支付能力的减弱。

宗室们失去了政治上发展的机会，又不准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加禄赐。

政府为他这一府郡王每年支付的禄米竟在十万石以上，超过国初的十个亲王，朝廷也不免为之震惊。于是特别下令自今以后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这是明政府着手限制宗室人数的第一步措施。然而，这种限制并不能收到多大效果。

享禄甚多的亲王们为了表明自己同朝廷本为一体，也咬咬牙“自动”奏请岁减禄米五百石至二千石。这次惊动全国各府宗室的改革总算略有进展，如郡王不分初封、袭封岁禄都按一千石支给；正式实行本折兼支制度，郡王和将军因禄赐较多按三七折支，即三分本色（米），七分折钞；中尉额定禄米较少，照顾一点按四六折支；郡、县、乡君及仪宾因世代已远，又属外姓，故按二八折支。此外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修小补。李春芳等人把这些改革加上过去变更的先例共计六十七条汇集成篇，由嘉靖皇帝赐名为《宗藩条例》，颁布实行。万历十年又对《条例》作了一些调整和删订，定名为《宗藩要例》。

明中期以后在宗室问题上的改革可以归结为：一、通过限制妾媵数目抑制宗室人数的急剧上升；二、通过奏减和折支等办法减少原定禄米数额；三、宗室受禄年龄由十岁提高到十五岁开始支给；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的浮费。很明显，这些改革都是着眼于渡过眼前的财政难关，而对于宗室问题上的根本弊病则不愿触及。自嘉靖初年起，廷臣和宗室当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就一再建议朝廷开放宗藩之禁，让宗室人员自由迁徙，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各业。例如襄府枣阳王在请追崇兴献王的疏中就谈“到宗室久锢穷困，欲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这本来是解决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国家既可以免除部分负担，宗室也谋生有路不致坐以待毙。然而，各种因循守旧势力的从中作梗，使本来就已经积重难返的局面更加无法作出重大改革。以开放宗室出仕之禁为例，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镇、辅、奉三级将军都是一至三品大员，“难于授职”，镇、辅之级中尉科举及第后都要安排四、五品官职也很困难。因此，开初只准许奉国中尉入试。到万历三十四年八月，礼部侍郎李廷机上言：“封爵、科目原属两途。彼既愿从科目，中式后自应照士子出身资格一体铨选，何拘原爵？”朝廷才发布诏令准许宗室中的将军、中尉“俱得与生员一体应试。进士出身者二甲选知州，三甲选推官、知县，其以乡举出仕者亦照常除授，俱不得选除京职”，总算为一部分宗室开放了出仕的可能性。这一改革



## 《明朝没有沈万三》

虽然被沈德符赞之为“二百年来最快心事”，但就效果而言不过在明末官场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点缀，对于解决宗室禄给和出路问题却起不了多大作用。

这样，在明后期宗室内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亲王们因分封时贵为帝子，禄赐丰厚，又霸占了大批庄田，积累的钱财富堪敌国；而品级较低的宗室却因生活无着不免胡作非为。

### 3、《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第50页

“洪都被围既久，内外阻绝，音问不通。”朱文正手下的战将和士卒伤亡惨重，他知道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决定派千户张子明用东湖（东湖在南昌城内）里的小渔船趁夜间陈军不备之时从水关潜出，“越石头口，夜行昼止”，六月二十五日历时半月才到达朱元璋住处，报告了南昌危急的情况。朱元璋问他陈友谅兵势如何？张子明回答道：“友谅兵虽盛，而战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贼之巨舰将不利用，又师久粮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当即指示：“汝归语文正，但坚守一月，吾自当取之，不足虑也。”张子明返回途中在鄱阳湖口被陈君捉获。陈友谅对他说：“若能诱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贵。”张子明假意答应，在陈军押送下来到南昌城下，大声呼喊：“大军且至，但固守以待。”陈友谅大怒，下令将其杀害。

### 4、《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第1页

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驳陈学霖

### 5、《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第3页

到目前为止，从民间到学术界都说沈万三是明初人，至少认为他的主要事迹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沈富（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张士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12年以上。《吴江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就沈万三子孙的生活年代来推算；二是从同沈氏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的记叙中来论证；三是从可信文献中看沈万三本人的活动年代。

### 6、《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第1页

明洪武元年（1368年）时，沈万三（沈富）的儿子沈荣已经62岁，孙子沈森39岁，上距沈万三的出生至少在80年以上。我们固然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80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沈荣的墓志铭足以推翻明代大量野史笔记并为《明史》采用的沈万三在洪武年间被充军云南的说法。

如果一定要为沈万三提供一个大致的生活年代，那么，我们可以推断他出生于1286年前后（其子沈荣生于1306年），死于1348年至1356年之间，大约活了六七十岁。

既未出仕无政绩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其子孙不仅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且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一方面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和命地方官推荐各类人才的措施下出头露面，甚至担任朝廷官职；另一方面同当地

## 《明朝没有沈万三》

的文人有较广泛的交往，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沈家的一败涂地是从洪武二十六年“蓝党”事件开始的。自从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英雄”突起，他创建的大明帝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以大将军凉国公蓝玉为首的“谋反”案应运而生。

### 7、《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笔记-沈万三家族的基本情况

在“多看阅读”里看了一点开头，有一处疑问，治学严谨的顾诚怎么没发现“沈万三有几个儿子”这里的自相矛盾的结论。认为沈万三的儿子除了沈荣（字荣甫）、沈旺，可能有个儿子的字是达卿，可能有个儿子叫沈茂，也可能就是沈茂字达卿。

可他忘了前面两个墓志铭说了沈荣有两个儿子沈森（字茂卿）、沈彬，在古代要避讳，沈森不可能取个字，跟亲叔叔名字部分相同。

《吴江县志》中“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中的茂、旺可能是侄子和叔叔，“二子”不一定解作“两个儿子”，也可解作“两个男子”。而且县志是乾隆年间的，离明初有三百多年。

# 《明朝没有沈万三》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